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



新编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

# 中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版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主 编 王处辉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



新编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

---

# 中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版

---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主 编 王处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思想史/王处辉主编. —3 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2  
新编 21 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20919-7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政治思想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D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9249 号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  
新编 21 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

### 中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版

主 编 王处辉

Zhongguo Shehui Sixiangshi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3 版
印 张	34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738 000	定 价	59.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主 编 简 介

---

**王处辉**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著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等，主持编纂《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6卷本）等，在《社会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 50 余篇。

## 内 容 简 介

---

本书以时代与社会发展为逻辑线索，对从先秦至 20 世纪初中国历代思想家的社会思想做了系统介绍与评价，使学生或一般读者能系统地了解中国社会思想产生与发展的总体线索。本书充分体现了作为社会学核心课教材的要求，重点突出了中国社会思想与西方社会思想的不同特点，并充分反映了本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



## 第三版序

这部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从2002年作为“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发行第一版以来，一直受到全国社会学系师生及社会广大读者的厚爱，并受到教育部有关部门的支持与肯定。本书第二版很荣幸地被教育部确定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并被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列为推荐教材。

本书作者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本着对学术负责，对社会负责，对社会学学科发展负责，对中国社会思想史任课教师与学生负责，对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及广大读者负责的精神，随着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深入，在吸纳最新研究成果，听取来自中国社会思想史任课老师、修习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的大学生与研究生，以及社会广大读者的要求与意见的基础上，于2009年对本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订，并出版了本书的第二版。关于本书第二版之特点，以及我们当时修订时的基本理念，我已在当年所写的第二版序言中做了说明，兹不重复。本书第二版出版发行以后，收到良好效果，得到社会学界及广大读者的更多支持与肯定。但我们深知，“生也有涯，而学也无涯”。这些支持与肯定是对我们所开展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鼓励，并不代表我们的工作没有缺点或不足。时代在进步，中国在发展，中国社会学在深入，我们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的任务还很重，虽然我们取得了一点成绩，但只是刚刚起步而已。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前面的路不但很长很长，而且永远没有终点。在本书第三版出版之际，我想就以下问题谈谈心得体会。

第一，中国社会思想史在中国的社会学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我从1982年进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至今，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学三十年的发展路向，也在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研究岗位上虚度了三十三春秋。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多少也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成就与不足有一些心得体会。纵观中国社会学三十多年的发展史，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学科已经从最初的移植西方理论与方法粗浅地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到了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

法深入地研究中国社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社会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公认的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数据预示，以购买力评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中国经济总量2015年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人民的生活明显改观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显著提高了，中国社会学界当初那种炒作西方理论与概念的时代也随之成为过去。特别是自党的十七大提出“四大建设”（十八大又扩大为“五大建设”）以来，中国社会学界服务于社会建设的热情非常高涨。培养“知世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新一代社会学工作者，已成为我国高校社会学院系的共同目标。社会学前辈们自20世纪30年代即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目标，经过八十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基本实现，我们的更高目标已经不再是“社会学的中国化”，而应当是建设“中国的社会学”了。进入新世纪以来，建设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成为社会学界的时代最强音。

中国的社会学应当如何建设？学者们在思考，在探索，在实践。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中国的社会学必定是以形成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为标志的。而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必须从中国传统优秀社会思想与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实践有机结合，并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社会思想与理论中才能形成。照搬西方的社会学，绝不可能发展出“中国的”社会学理论。陈寅恪在论述“道教之真精神”时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2014年9月，余英时先生在台湾地区获“唐奖”时曾说道：“中国文明不但起源于本土，而且是循着自己的独立途径成长起来的。……和以往不同，在重建和阐释中国文明的演进过程时，我们开始摆脱西方历史模式的笼罩。换句话说，从西方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演进模式可以对中史研究具有参证和比较的作用，但中史的重建却不能直接纳入西方的模式之中。我们现在大致有一个共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主要在自身的内在动力驱使之下，前后经历了多次演进的阶段。但为了对于中国文明及其动态获得整体的认识，我们必须致力于揭示中国历史变动的独特过程和独特方式。”这些国学大家的结论很值得当下我国社会学工作者学习和体会。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与政府最高领导集体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问题不断有新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4月在欧洲学院演讲时曾指出：中国如全盘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如果我们把这一观点引入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建设与发展之中，我们便可以

说,如果中国社会学全盘照搬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同样会有水土不服问题,也同样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习总书记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中国的一流大学建设时说:“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如果我们把这一观点引入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建设与发展之中,我们便可以说,中国社会学理论必须有中国特色,如果我们跟在西方社会学理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要建设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也同样是不能成功的。所以说,必须以服务于中国的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发展需要为目标,在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同时,认真发掘中国传统优秀社会思想的现代性元素,并将其融会贯通,实现习总书记所要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是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建设的必由之路。因此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思想史在当前及今后中国社会学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

第二,传统优秀思想文化与中国社会学理论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系问题。

从党的十七大提出“四大建设”,特别是到十八大又增加生态文明建设而成为“五大建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据我个人的统计,仅自党的十八大至今的两年多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至少有十九次强调我国的文化建设及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2014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



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含义。希望中国和各国学者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把这个课题研究好，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

“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 65 年来，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两年多时间里如此高频度地反复强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价值，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从以上摘要引述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新一届党和政府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现代性意义的高度重视，也可以从中引发我们对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发展方向的新认识，以及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与教学之重要性的认识。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并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问题，应当成为我们今后很长时间内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努力方向，并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努力方向，甚至可以说应当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努力方向。

第三，社会学专业课程设置中轻视传统社会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学专业人员的“补课”问题。

如前所述，虽然我们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在中国化的道路上有长足进步，但是我们考察当下中国高校社会学专业本科生课程的设置，却还是西方理论与方法课程占用了大量学时。在十门主干课程中，涉及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只有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一门课程，且仅有 60 个课时，而且还可以用“中国社会学史”代替这门课程。于是，开设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的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在学四年，必须修习完成的 150 多个学分中，只有 3 个学分是修习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的课程，而那些只开设“中国社会学史”而不开设“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在学四年，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的课程的修习几乎为零。试问，以这样的培养方案教育出来的社会学专业毕业生，在建设中国的社会学之进程中，将如何充分发挥作用？在社会学领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使命中，能多做出什么贡献？我国现有一百多所大学开设了社会学本科专业，



但实际开设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的，却不足百分之六十，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培养阶段开设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课程者则远不足二分之一。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除了修习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就是修习以介绍西方为主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一些研究水平较高的大学开设了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各类问题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学分支课程，却对当代中国各类问题与传统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关系知之甚少。一些分支课程的教师，虽注意当代中国与西方社会的比较，却没有能力对当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关系进行深入解读，这样的比较教学，很可能存在着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严重“水土不服”问题。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虽然这是针对如何培育和弘扬当代核心价值观而言的，但对我们进行社会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也可以说：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文化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激荡发展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国的社会学专业开办至今，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应该具备了自立自强的能力，我们的社会学专业课程体系到了必须反思与改革的时候了。

我们不仅对社会学专业的培养方案如此担忧，对当前中国社会学教学与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也同样有所担忧。比如，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界的一代宗师费孝通先生，在他晚年反复强调中国社会学要“补课”，在很多文章中告诫中国社会学教学与研究者们，要重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与此同时，我国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如陆学艺先生、郑杭生先生等学者多次撰文呼吁中国社会学界要加强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的研究，他们还身体力行，组织编写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著作或资料选辑。令人不解的是，他们的呼吁提倡，并没有在中国社会学教学研究队伍中引起应有的反响，其原因何在？以我的考察，原因就是当下中国的社会学专业队伍中，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的知识基础薄弱的人太多了，在国内接受社会学专业训练的，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修习情况如前所述，少得可怜；而在国外接受社会学专业训练的，所修习的完全是西方社会学知识，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必然更加陌生。以这样的知识结构为主体构成的中国社会学专业队伍，即使有意响应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号召，大概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民族自尊与民族自信不断提高，党和政府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性意义高度重视的今天，我国的社会学专业队伍，确实如费孝通先生所告诫的那样，应该好好地“补课”了。中国的社会学专业人员，如果不能补好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的课程，就难以在实现社会学理论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

第四，这部教材编写的原则与教师讲授时的详略问题。

据我们的体会，教材的编写与专著的撰写有显著区别。专著同样以服务于当代学术发展及经济社会建设为目标，但却可以按作者的偏好，将作者对有关问题的所有心得与创新都写入书中，只要言之成理，无论读者群有多小，并不必特别关心。专著强调知识或理论的创新而成一家之言，即或一时无人能读懂，也可以藏之名山，以待来者。但教材却不能这样做。早在19世纪末，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一书中，即提出编写教材的四项原则，他很可能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早地系统提出教材编写原则的第一人。张之洞说：“学堂之书，但贵举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我试就个人的理解谈谈对张氏提出的四原则的认识。

张氏提出的教材编写原则之一为“举要切用”。所谓“举要”，就是选取最为重要的知识内容，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面面俱到；所谓“切用”，就是所举之要必须以经世致用为目标，或者说必须以服务于当代的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建设为目标。我们将这一原则用于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就必须选取历代社会思想发展中在当时最具创新性，而对当代又最具社会学意义及现代性的社会思想加以介绍与阐述。

张氏提出的教材编写原则之二为“有限有程”。所谓“有限”，就是内容要有所限定，对不同教育程度的学生的教育内容有不同的限定，即教材的知识内容与深度要循序渐进，根据教育对象和教育目标而定，不能无边无际，对学生提过高要求；所谓“有程”，就有要有系统，有教程，不能依编写者的偏好或兴趣倚重倚轻。将此原则用于本教材的编写过程，就是要做到教材内容与知识总量不能太过宽泛，章与节的设置也必须做到知识内容与逻辑的系统性。

张氏提出的教材编写原则之三为“人人能解”。所谓“人人能解”，就是要求教材必须做到深入浅出，语言流畅，适应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们的一般知识能力与阅读理解能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读得懂，不能写得太过深奥晦涩，味同嚼蜡，也不能让学生读起来如云里雾里，望而生畏。所以小学教材与中学教材的写法不能完全一样，大学教材与中小学教材的写法也不能相同。同样是大学教材，专业课教材与公共课教材也不能采取同样的写法。我们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教材是大学社会学专业的专业课教材，考虑到社会学专业学生对古代汉语的阅读能力有限，所以我们才尽量采取用现代语言阐释传统社会思想的写法，把大量原始文献放到注释之中，以备有志于深入研习的学生阅读。

张氏提出的教材编写原则之四为“人人必解”。也就是说，凡是写入教材的知识内容，都是要求学生们必须认真学习熟练掌握的，严格地说只有全面掌握了

教材所提供的知识内容的学生，才是可以得一百分的优秀学生。中小学教材与考试基本上是按这个原则进行的，大学教材与教学成绩考核虽也应坚持这一原则，但我却认为不必这样刻板。大学教育要求先生讲授与学生自学相辅相成，教授只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大学文科教材内容比教师讲授的更为宽泛一些是正常的。此原则用于我们的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写入教材的知识范围要宽于教师讲授的知识范围，以便给学生们留出自学的空间。更何况大学授课，强调教、学、研一体化，教师可以一部教材为主，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生接受能力，自编授课讲义，对各章节讲授内容的详与略可由任课教师自行安排。据我的经验，凡是按一部教材在课堂上照本宣科的大学文科教师，一定不会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大学教材中要求“人人必解”的部分，如果教育部没有在教学内容要求的规定中明确，则应是教师讲授及任课教师指定学生必会必解的那一部分。所以在大学里，授课教师的研究能力与专业学术水平就显得格外重要。

第五，关于本次进行教材修订的工作目标与修订内容问题。

我一直认为，要编写出一部好的教材，其难度绝对不亚于撰写一部学术专著。而且一部好专著未必可以成为一部好教材，但一部好教材应当同时可以成为一部好专著。按上述张之洞提出的教材编写四原则，我们使教材与专著具有了一些显著区别。此外，我在为本书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引用了南开大学前校长侯自新先生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教材是‘教’出来的，不是‘编’出来的！”我至今仍将此语视为至理名言。教材的好与不好，必须通过教学实践过程的检验。或者说，教学实践与效果是检验一部教材好与不好的唯一标准。本书第二版发行之后，被全国很多社会学专业所采用，据我们所做的本教材实用效果调查，大家普遍反映与第一版相比有显著进步，在教学中受到普遍肯定。但也提出本教材存在着字数较多的问题，知识内容太多，教师在40或60个课时的规定之下，没有办法全部讲授及学生难以通读。本教材是按至少80个学时编写的，由于一些学校安排的课时不足，造成教师只能重点讲授，学生不能系统地阅读教材，而觉得此教材较厚、内容较多，是很正常的。这次修订也没有对内容进行大范围的删减。

本次修订没有对全书章节的设置结构进行调整。因为根据我三十多年教授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的经验，并广泛征求全国多所院校授课教师的意见，均认为第二版确定的章节结构已经比较成熟，也比较便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目前也还没有更新、更好的变革全书结构的成熟方案，所以仍然保持了第二版的格局。

这次的修订工作，全书各章节的作者没有变动，由我对全书进行了统校、统改。我修订后的书稿，又请参加本书第二版编写的宣朝庆教授对唐代及以前的部分、刘集林教授对宋代及以后部分的书稿分别进行了校读，他们提出的修订意见



也被采纳。这次修订的重点如下：其一，将新的学术成果补充进去；其二，将我认为不太必要的延伸性论述进行了删除；其三，将我认为全书前后提法不太统一或表述不太准确的文字进行了修改；其四，将原来征引出处不准确的注释进行了修正；其五，对第二版中存在的丢字、错别字或行文不太顺畅之处进行了修正；其六，保持第二版采取的正文中尽量使用现代汉语，而将原始文献放到注释中的特点，并将更多的仍在正文出现的原始文献移入注释之中。我相信，经过这次修订，本书在总体质量上定会有所提高。

此外，根据教育部对大学本科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要求，为了满足社会学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拓展学术视野，以及深入研习中国社会思想史的需要，在这次对本书进行修订的同时，我们还编写了一部与本书章节设置相同、内容完全同步的《中国社会思想经典要义》，将本书中所引用的，以及本书虽没有引用但有助于对本书所论及的思想家及思想流派之社会思想有更深入全面理解的经典原始文献进行了编辑整理，并对这些原始文献做了必要注释。我们相信，如果读者能同时阅读这两本书，对中国历代社会思想的理解深度定会比只读本书有显著提高。

本书此次修订工作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领导及潘宇、宋义平、汤慧芸三位编辑的大力支持，我们深表感谢。

虽然我们相信经过此次修订，本书会比第二版更加完善，但仍会有一些缺点和不足，恳请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师生及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今后进一步对本书加以修改完善。是为序。

王处辉

2015年3月

于南开园



## 第二版序

一本好的教材，必须经过多年教学实践的锤炼。前不久，我与我们南开大学前校长侯自新教授讨论“中国何以跻身一流大学的方略”这一研究课题时，曾讨论到一流大学的教材建设问题。他以自身从教40年并做了十几年大学校长的经验，总结出了似乎很平常的一句话，他说：“教材是‘教’出来的，不是‘编’出来的！”他认为，好的教科书不是用一两年就可以在书斋里“编”出来的，而是必须建立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在先生“教”与学生“学”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地锤炼、增删、修订，这样才能形成一部经得起检验的好教材，而且即使是一部被公认的好教材，也还总要不断地在教学过程中锤炼、增删、修订，与时俱进，才不会落伍。他的话之所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我认为此乃至理，二是它符合我多年来教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写中国社会思想史教材的感受。虽然由我主编，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是在我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20多年的基础上完成的，且已被全国多所大学的社会学系作为指定教材使用，但我个人仍以为它离我心目中的“好教材”还有相当的差距，它还必须不断地在教学过程中锤炼、增删、修订，以吸纳最新研究成果，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解决任课教师与修课学生在教与学过程中的困难与不便，方能向“好教材”的方向不断迈进。

时间过得真快，我从1982年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屈指算来至少已给25届社会学专业本科生讲授过这门课程。从1989年我出版第一本《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至今，也有20年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教材的第一版是在2002年，弹指之间也已过去了7年。作为教材，到了非修订不可的时候了。其实在两年以前，我们就开始了修订工作，2007年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潘宇编辑就与我签订了出版本书修订本的协议，并希望我能尽快地完成修订工作，但至今才算完成此任务。除了一些不能成为理由的原因之外，主要是我对如下问题的思考一直没有如意的结论，即如果没有新的突破，怎么能叫“修订”呢？如何通过修订，克服各校教师与学生在用此教材时遇到的



困难？通过修订让本教材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可能性和路径在哪里？中国社会思想史与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如何接轨？如何认识和解读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现代性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困扰之下，修订工作竟然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至今才与读者见面，但是否在回答上列问题方面有所进步，仍不敢断言。这次修订主要做的新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思想史”的定义进行了新的提炼。定义的修订是件大事，对于一个学科的定义，要改动其中一个字都是有困难的，初版时我对社会思想史的定义是：“社会思想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念、构想或理论。”这本是我在20多年前总结和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定义，已使用了20多年了，但我总觉得这个定义仍不尽如人意，经近年反复思考，在原先“社会思想”定义的基础上做出如下新的界定：

社会思想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秩序的构建、管理及理想社会模式的观念、构想或理论。中国社会思想史就是研究历代中国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秩序的构建、管理及理想社会模式的观点、构想或理论发生、发展和继承或斗争的内在历史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学科。

第二，对本书的下限做了延伸。本书第一版的下限是社会学在中国出现，以孙中山的社会思想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对民国时期的社会思想没有介绍。但作为一部完整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教材，如不包括民国时期的社会思想，总觉得是个缺憾。这次修订增加了一章，即“民国时期价值多元化趋向中的社会思想”，我们认为，民国时期的社会思想十分活跃，但总括地说，除了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之外，主要有三大流派，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限于篇幅，只选了这个时期三个代表性人物，即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的社会思想进行分析评介，以此反映这个中国思想界新的“百花齐放”时期社会思想之大致面貌，虽仍显不够详尽，有挂一漏万之虞，但有利于让读者对民国时期的社会思想有初步了解，并增强了教材的完整性。

第三，对古代文献原文做了有利青年学生们阅读的安排。我们在多年教学实践中发现，有些学生阅读和理解古代原始文献有一定困难，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阅读古汉语文献的能力一般比不上历史或中文专业的学生，教材中原始文献太多，可能影响学生对历代社会思想家之思想内容的理解程度，进而影响教学效果。为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次修订过程中，我们在正文中尽量少引述原始文献，而是改用现代汉语表述思想家的思想意涵，而将一些原始文献移入注释之中，这既便于一般学生的阅读，也让愿意深入研读的学生或读者仍可方便地读到原文，并让方家检验我们在正文对思想家之思想意涵的解读是否准确无误。

第四，保持第一版中每章之后有“本章要点”、“复习思考题”和“推荐阅读书目”的做法。要点力求简明扼要，将我们要表达的核心意思交代清楚；复习思考题则以巩固核心知识与调动读者的发散性思维为目标，给有意在此学术领域深造的学生及读者们自主地开展深入研究与思考的充分空间；推荐阅读书目则是以为学生及读者找到继续深入研读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资料提供便利，引导学生及读者将多种相关著作进行比较阅读和研究。

第五，采取了以“篇”表达历史时序性，以“章”的名称表明社会思想之特性的做法。本书第一版采用了以“篇”表达社会思想的历史时序，而以思想家为单位进行分“章”的做法。我们在多方倾听各校任课教师和学生的意见时发现，有些教师反映，教材章数太多，在规定的本课总学时之内，没有办法将全书内容讲授完毕，而有些学生则反映，章数和思想家都太多，在记忆时容易将不同思想家的相近思想混淆。为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在修订时采取了将思想内容有共性或有可比性的思想家之社会思想合并为一章的做法，并在章名中体现该章所介绍的思想家之社会思想的特性，例如：我们将孔子与孟子的社会思想合并为一章，该章取名为“‘法先王’以重建社会秩序的孔孟儒家社会思想”；将老子与庄子合并为一章，取名为“‘法自然’以恢复社会秩序的老庄道家社会思想”；又如，墨家与杨朱本来是没有直接思想共性的两个学派，但孟子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都曾一时成为“显学”，他们在那个时代思想界中有一个共性，即他们都是要标新立异，想用一套新思想、新方法治理社会，重构群体社会生活的秩序，所以我们将墨家与杨朱合并为一章，取名为“颠覆传统以重构社会秩序的墨家、杨朱社会思想”；再如，荀子本属儒家学派，但后人却将《荀子》一书归入“子学”之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社会思想与孟子等人有显著区别，即他更注重通过外在控制来实现社会生活秩序的重构，这种思想倾向再往前迈进一步，就成为了法家思想的理论来源，这也是他的两个学生都是法家代表人物的重要原因，据此，我们将荀子与他的学生韩非的社会思想合为一章，取名为“‘法后王’以改造社会秩序的荀子及韩非法家社会思想”。采用同样的思路，我们将《礼记》、董仲舒、《白虎通义》的社会思想合为一章，取名为“汉代官方儒学的社会思想”；将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合并为一章，取名为“宋代功利主义儒家的社会思想”；将王守仁、王艮、何心隐、李贽合并为一章，取名为“明代心学及其平民化儒学的社会思想”；将龚自珍、魏源合并为一章，取名为“晚清之西力东侵初期的社会思想”；将太平天国洪秀全、洪仁玕与孙中山的社会思想合为一章，取名为“农民与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社会思想”，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都是晚清时期以颠覆旧的社会生活秩序为目标的革命性质的思想。陈独秀、胡适、梁漱溟本身并没有太多思想的一致性，甚至他们的社会思想



之间相互还可能是冲突的。但我们还是将三人合并在一章之中，该章名为“民国时期价值多元化趋向中的社会思想”，意在通过这三位思想家向读者展示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思想之发展特征与大势。

第六，坚持社会思想史发展时序性原则的同时，强化了思想内涵的关联性原则。在以“篇”划定的时间段内，强化了不同思想家之社会思想的关联性和特性的展示，适当淡化了对思想家出场次序的历史时间要求。在本书第一版中，我们较严格地按思想家的生卒年排列出场次序，这样做的优点是历史感强，但思想内涵的特性与关联性却因之被打乱了，如孔子与孟子，老子与庄子，《太平经》与葛洪，李觏与王安石、陈亮、叶适等人，王守仁与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人，其社会思想内涵的关联性很强，特性较一致，但受各自生卒年的限定，无法合在一起讲授；我们认为，作为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学习中国社会思想史，相对于历史专业的学生而言，最主要的目的是学习借鉴前人社会思想之精华，为当代社会研究与建设服务，而不是为了研究历史学而学习社会思想史，所以与其说他们需要关注思想家生活的具体时间，不如说他们更需要关注社会思想家们所处的那个大的时代的社会生活秩序建构与管理中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是什么，在那样一个大的历史时期，为解决群体生活秩序中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他们的思想及提出的哪些思想理论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故此我们在修订过程中，以“篇”规定出一个大时代、大时段，但在同一个大时代、大时段之内，不以思想家生卒年排列思想家次序，而是以其社会思想的关联性及其特性的相对一致性划定“章”，以“节”排列思想家，为尊重历史的时序性，在同一章之中思想家的排序仍以生卒年为依据。

第七，将社会思想回归到它所发生的时代中加以介绍和论述。“中国社会思想史”并不等同于“中国社会史”，但社会思想是源于人们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的，所有的新社会思想，都是思想家们面对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而发的，包括他们对理想社会的新构想，都离不开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与困惑。我们在研究中深刻认识到，所有社会思想家都是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人，他们并不是只为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活着，而是要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解决他们所处时代面临的社会生活秩序问题，志向更宏远者还要进而“为万世开太平”。无论他们的思想是否可以为我们当下所接受，我们都有必要将他们的社会思想放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考察他们思想的时代价值和创新性，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故此我们希望研读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生或读者，都要将社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与社会史结合在一起去认识，这样才能客观公正地认识某种社会思想的存在价值与存在合理性，不致在戴着有色眼镜或“屈光不正”<sup>①</sup>的情况下去盲目地

<sup>①</sup> 在医学上，“屈光不正”是指眼在调节放松时，平行光线通过眼的屈光作用后，不能在视网膜上结成清晰的物像，而在视网膜前或后方成像。它包括远视、近视及散光。在此比喻不能科学正确地对待前人思想成就者。



褒贬前人社会思想的价值和创新性。为此，我们在每“篇”的开始加入了对该篇所涵盖的历史时期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社会历史情况的介绍。

第八，做了一些内容的增补与删节。为了加强社会思想的系统性与全面性，我们新增补了先秦的杨朱、汉代的《白虎通义》、明代的王艮、近现代的梁启超，以及前文已经言及的民国时期的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思想家或著作的社会思想。同时删除了郑观应等人之社会思想。对第一版中论述的其他社会思想家之社会思想也有所增删，限于篇幅，在此不便一一介绍。

这次修订工作中，撰写人也有所变动，第十章第一节“《礼记》的社会思想”，仍由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桂胜博士撰写；第二十二章“晚清之西力东侵初期的社会思想”、第二十三章第一节“康有为的社会思想”、第二十四章“农民与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社会思想”，由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田毅鹏博士撰写，第二十五章“民国时期价值多元化趋向中的社会思想”由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集林博士撰写；第二十三章第二节“梁启超的社会思想”由田毅鹏与刘集林共同撰写；全书中各篇开篇部分的社会历史情况的介绍及第十章第三节“《白虎通义》的社会思想”、第二十章第二节“王艮的社会思想”由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宣朝庆博士撰写，宣朝庆博士还协助主编做了将正文中的原始文献移入注释的工作及一些章节安排的调整工作，其他各章节均由本书主编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处辉博士撰写。此外，各章要点及参考文献的修订得到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董向慧和孙跃的协助。

本书的修订出版工作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潘宇女士为此投入了大量心血。于此谨对上述协助我们完成修订工作的各位撰写者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各位编者致以真诚的感谢。

本书的修订版可能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正如我在开头所论及的那样，“教材是‘教’出来的”。我们将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并广泛听取全国各大高校教师与学生们的宝贵意见和建议，相信在三五年后，我们如再次进行修订的话，定能使本教材的质量再上一个新台阶。故此，敬请各位同行教师、学生及广大方家读者不吝赐教。各位可将意见、建议直接发到我的电子信箱(wangch@nankai.edu.cn)。我愿意通过任何形式与各位师生及同行学者及方家读者就相关的任何问题交换意见或进行学术讨论。只有大家共同努力培育，中国社会思想史之学术发展之树，方能长青。

是为序。

王处辉

2009年2月10日

于南开园